搶位之禍

◎ 劉方遠 韋繁

——李源潮：曾慶紅傳人 令計劃搭檔



團派核心 太子黨骨幹 上海幫傳人 北大幫新秀
久不服李克強 李源潮總理夢 令李奪權計劃
令計劃進去了 李源潮命運要看習王惻隱之心

明鏡出版社









蘋果版 PC 版 推特版 電子版 印刷版 臉書版 谷歌版

目錄

1. 不得不重新認識李源潮
    1. 不得不重新認識李源潮
    2. 校友的失望和沮喪
    3. 他是曾慶紅的傳人？
2. 第一章 親生父母
    1. 父親李干成
    2. 獄中帶頭絕食
    3. 一直要求恢復黨籍
    4. 打響漣水抗日第一槍
    5. 恢復黨籍，指揮反掃蕩
    6. 韓戰爆發，李援朝出生
    7. 當上了上海市副市長
    8. 母親呂繼英與第一任丈夫李超時
    9. 李超時被殺，僅25歲
    10. 李呂戀遭冷嘲熱諷
    11. 同母異父的兄長
3. 第二章 兄弟姐妹
    1. 父親拒上賊船被打倒
    2. 揪來揪去
    3. 兒子只能看一眼
    4. 平反後任市政協副主席
    5. 百年誕辰，子女高調亮相
    6. 李家的七個子女
    7. 長子學原子能物理
    8. 第一批核安全專家
    9. 李偉之和李健之
    10. 李健之拒百萬年薪
    11. 李申初與朱克家齊名
    12. 李家的傣族媳婦
4. 第三章 礦山長大的養子
    1. 從小過繼給小姨
    2. 學習成績中等偏上
    3. 穿的都是舊衣服
    4. 康平路大院
    5. “黑五類”子女
    6. “逍遙派”
5. 第四章 大豐農場當知青
    1. 第一批上海知青
    2. 邊幹活邊流淚
    3. 消耗青春的方式
    4. 最小的戰友
    5. 故地重遊
    6. 萬人暴動，李源潮親臨現場？
6. 第五章 兩次上大學
    1. 工農兵學員
    2. 中學老師
    3. 考入復旦數學系

4. 低調得默默無聞
5. 曾經滄海難為水
6. 谷超豪的得意門生
7. 畢業時想考研究生
8. 蘇步青點名留校
9. 陳不顯助其踏上仕途
10. 升得太快
11. 陳不顯與胡耀邦
7. 第六章 團中央到新聞辦
1. 第四把手
2. 團中央的“二李”
3. 同門師兄弟
4. 向恩師鞠躬致敬
5. 與官場格格不入
6. 想回上海，遭曾慶紅拒絕
7. 同窗情誼
8. 沒有投井下石
9. “老九不能下”
10. “六四”期間的表現
11. 寫“過關”總結
12. 聲援遊行
13. 調離團中央
14. 當上國新辦副主任
8. 第七章 四年仕途低谷
1. 部長沒把他放在眼裡
2. “左”得要命
3. 遭孫家正排擠
4. 孟曉駟對李源潮“很不服氣”
5. 兩軍不如一武
6. 十七大前的黑馬
9. 第八章 封疆大吏
1. 新世紀時來運轉
2. 從南京起家
3. “南京的困惑”
4. 鐵腕治吏
5. 虎頭蛇尾激民憤
6. 特大投毒事件
7. 震驚中央
8. 速破案胡總滿意
9. 升任省委書記
10. 鹹魚翻身施展抱負
11. 鐵本事件
12. 專赴中央檢討
13. 賣官案掀翻江蘇官場
14. 非常時刻頻亮相
0. 第九章 十七大飛黃騰達
1. 主張黨內民主，要當民主試點
2. 得胡總真傳？
3. 言語間流露自豪
4. 遭遇公共危機
5. 打親民牌，意在減壓

6. 仇和的燙手山芋
7. 百姓要罵娘
8. 一手提拔的“酷吏”
9. “硬漢”的膽量
10. 江蘇的三個世界
11. 謹遵母旨關注連雲港
12. 十七大脫穎而出
13. 備胎中的備胎
14. 掌中組部，胡用心甚遠
1. 第十章 中組部部長
1. 輿論充滿期待
2. “治部”方略
3. 被“潛規則”觸怒
4. “開刀”談何容易
5. 要遏制吏治腐敗
6. 頻頻出招
7. 發起救亡行動
8. “共產黨有危險”
9. 劍指李堂堂
10. 包養情婦12年
11. 被普遍看好的中組部長
12. 神秘的中組部
13. 地下黨式的運作
14. 博士文憑遭質疑
15. 博士論文像領導發言稿
2. 第十一章 李源潮的計劃
1. 大手筆吸引海歸
2. 特殊待遇
3. 回上海談“千人計劃”
4. 與老同學敘舊
5. 親自赴美招攬人才
6. 哈佛情結
7. 肯尼迪學院
8. “千人計劃”遭叫停
9. “三陪”引發爭論
10. 網友不買帳
11. 悲觀的大學生村官
12. 李談“三種人”
13. 習提“兩種人”
14. 習李理念最接近？
15. 習提任命案，李拖著不辦
16. 說一套，做一套
17. 提拔“兩派”官員？
18. “十大最強音”
19. 新年文告：提前審判
3. 第十二章 十八大“失常”
1. 高調挺薄
2. 他真的不想當官？
3. 北戴河會議還是常委候選人
4. 突然“出局”
5. 俞上李下

    6. 李源潮為啥出局了？
    7. 因推動黨內民主“失常”？
    8. 海外有情婦，斂財無數
    9. 傳楊暉向習秘報
    10. 得票最少，鐵定失常
    11. 七巨頭亮相
    12. 遭李鵬強烈反對
    13. 懸在半空
    14. 突然活躍起來
    15. 為大學生村官出書作序
    16. 當上國家副主席
    17. 排名僅次七常委
    18. 仍被排除在外
4. 第十三章 “江蘇幫”遭殃
    1. 從失落到毀滅
    2. 季建業引爆江蘇政壇
    3. 無風不起浪
    4. 南京換季！
    5. 江澤民的馬仔
    6. 靠岳父發迹
    7. 江蘇首富供出季建業
    8. 情婦受審
    9. 李源潮一手提拔
    10. 巡視組進駐江蘇
    11. 楊衛澤落馬
    12. 企圖跳樓自殺
    13. 妻子秘書情婦一窩端
    14. 李源潮的第一嫡系
    15. 貪官都是老部下
    16. 大管家趙少麟被查
    17. 下一個是羅志軍？
    18. 中央早就不信任他
    19. 大秘被抓，情婦團隊露餡
5. 第十四章 當總理的野心
    1. 中共歷史的拐點
    2. 車禍，駭人聽聞
    3. “三角”政治聯盟
    4. 討價還價
    5. 私自調動御林軍
    6. 未遂政變
    7. 李源潮涉政變陰謀
    8. 收拾幕後幫主
    9. “令計劃名單”
    10. 令被抓，妻落網
    11. 令家李家門對門
    12. 李源潮的總理夢
    13. 三個團隊與奪權計劃
    14. 對明鏡惱羞成怒
    15. 李源潮是真急了
    16. 亮相闢謠，官媒不報導
6. 第十五章 妻兒的传闻

   1. 夫人是同學
   2. 岳父高崇智是南下幹部
   3. 音樂科班出身
   4. 音樂教育界名人
   5. 高光時刻
   6. 經常挖苦彭麗媛
   7. 兒子李海進
   8. “走後門”進復旦大學
   9. 留學耶魯的黑幕
   10. 被控性騷擾，CIA幫擺平
   11. 東京豪宅被曝光
   12. 跟薄瓜瓜令谷關係很鐵
7. 第十六章 神秘的小舅子
   1. 支持學運被撤職
   2. 前妻是陳數
   3. 跟左小青結婚
   4. 傳驚天緋聞
   5. 緋聞全是假消息？
   6. 緋聞男友
   7. 交往過密，假戲真做
   8. 與影帝傳出戀情
   9. 製片人也不放過
   10. 嫁入豪門
   11. 再晚也要回家
   12. 身家豐厚的富豪
   13. 网友吐槽：戲子嫁富商
   14. 成中央巡視組重點目標
   15. 姐夫管官，小舅子賣官
   16. 中紀委早就盯上他
   17. 仇和被查，包圍圈更收緊了
8. 後記
9. 版 權

不得不重新認識李源潮
——寫在前面

不得不重新認識李源潮

2010年3月，明鏡出版社出版了筆者撰寫的《李源潮傳》。整整五年時間過去了，當時的李源潮風頭正勁，是海內外媒體最關注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之一，也是最被看好的中共十八大常委候選人之一，更是海外留學人員和海歸們推崇的形象清廉開明的中組部長。

五年前，撰寫李源潮的第一本傳記時，筆者採訪了他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知青戰友、大學同學，還走訪了他的團中央同事、文化部的下屬、江蘇省的官員，還有熟悉李源潮家庭的熟人和朋友，獲得不少當時還不被外界了解的有關李源潮的第一資料。

雖然那本傳記寫的比較費心，斷斷續續的採訪拖了很長時間，主要是採訪對象忙得很難抽出時間來，如他的一位中學同班同學經常出差，約了一個多月後才接受筆者採訪，但筆者不得不承認，就寫作過程而言，五年前的心情和五年後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五年前寫李源潮時的心情是愉悅的。在筆者採訪他的諸多同學、同事和同僚時，他們所描述的記憶中的那個李源潮，都是普通得極富有人情味，上進但卻不想當官，甚至他當年的書生氣都與官場格格不入。無論是其個人從政經歷，還是家庭成員的個人情況，熟悉李源潮的人無不給予正面評論。

而李源潮留給筆者最深的印象，可能要比熟悉他的人來得更直接，更容易讓人產生好感。1989年的學運，對許多經歷者來說，是認識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一個窗口。當時的李源潮同情學運，“六四”過後又拒絕落井下石，甚至私下還發表過一些不滿言論，隨後便跌入多年的仕途低谷……

“形象清廉”，“思想開明”，是認識李源潮的人都經常提到的兩個概括。一位多年來一直近距離密切觀察李源潮的北京記者曾告訴筆者，主政江蘇時，李源潮的一些政治主張和嘗試，尤其是推動黨內民主建設，向中央請纓要把江蘇當成黨內民主試驗點等等，當時在北京精英階層贏得很好的口碑，這也是他擔任中組部長後被外界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

然而，十八大前李源潮遭遇一系列政治挫折，則出乎許多關注他的人的意料，其中也包括筆者。早前沒聽說過的負面傳聞出來了，早前不曾有過的政治雄心也好、野心也罷全都暴露了，甚至還深度捲入“新四人幫”政變陰謀……當這一切都集中在李源潮身上時，“不相信”或“拒絕相信”是筆者和像筆者一樣的李源潮關注者的第一反應。

確切地說，在中共十八大召開時，筆者也像許多人一樣，對李源潮進入政治局常委還是滿懷期待的。而這種期待並未因為他“失常”而消失，甚至延續到他擔任國家副主席之後。

想重新認識一個人並不容易。想重新認識一下李源潮，對筆者來說應該是更不容易的，因為那本《李源潮傳》，也因為有那麼多認識李源潮的人跟筆者一樣。

至今，在筆者的印象中，李源潮還停留在2010年。而2010年之後中南海所上演的一幕又一幕政治大戲，應該跟筆者早前認識的那個李源潮或許關係不大。

切割，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當明鏡出版社計劃出版這本有關李源潮的新傳記時，筆者只能與韋繁一道完成這部書稿。而關於2010年之後的李源潮的“那些重頭戲”，已不是筆者所要記錄的那個比較熟悉的李源潮了。

因為，像很多人一樣，筆者仍處在這個不得不重新認識李源潮的過程中。

校友的失望和沮喪

這幾年因為那本《李源潮傳》，筆者認識了數位李源潮的復旦大學校友，其中一位張姓校友因同住一個城市而有較多來往，現在已成朋友。

張校友跟李源潮一樣，也畢業於復旦數學系，用他的話說，他跟李既是校友更是系友，還曾在一個宿舍樓的同一層住了大半年。張校友說，他1982年進入復旦數學系時，李源潮剛剛畢業，留校在團委工

作。兩人曾有過幾次直接接觸，張校友一直稱李源潮是“同系老大哥”。

像許多復旦數學系畢業生一樣，這些年來李源潮是校友們聚會時必談的一個中心話題，校友加系友這層特殊關係，也讓本來就健談的張校友，一談起“同系老大哥”總是滔滔不絕。

但自十八大前傳出李源潮的種種負面消息後，張校友對“同系老大哥”的使用頻率開始逐漸減少，情緒也從一開始的憤怒，慢慢變成失望和沮喪。

還記得海外媒體報出李源潮在海外有情人的消息時，張校友給筆者打來電話，先是憤怒地指責稱這是媒體在有意抹黑“同系老大哥”，“不想讓他當上政治局常委”，接著又強調，“我們數學系在美國留學的有好幾百人，我們從來沒聽說過李有情人”，“我敢拿人格擔保，這些謠言跟李源潮毫無關係”，等等。

當十八大李源潮果真“失常”後，在2012年底的一次聚會上，張校友又把筆者拉到一邊說，“我的同系老大哥這次是遭到暗算了，這是我們復旦校友在校友論壇交流時得出的結論，但我們校友會相信李源潮本人是絕對能經得起考驗的。”

隨後的一年，這位李源潮的同系校友只會逢年過節打來電話問候一下，但都很少再提起他的“同系老大哥”。2014年秋天有關李源潮也捲入令計劃政變陰謀的傳聞，在海外媒體鋪天蓋地般流傳時，張校友在一個朋友聚會上，跟筆者有一次較長的交談。

此時的張校友在談起李源潮時，只是用“老校友”稱呼這位正處於風口浪尖上的中國國家副主席。張校友告訴筆者，復旦數學系的校友們都很擔心李源潮的處境，雖然校友們不願相信媒體所披露的內容都是事實，但從“老校友”這幾年的仕途走向看，他應該是“攤上什麼大事”了。

“當初‘新四人幫’這個詞一出來時，誰都不會相信，可這幾個人現在都被抓起來了。雖然我們復旦校友至今也不願意相信老校友的負面傳聞，但誰都知道，現在中共政壇的所謂‘謠言’，都是‘遙遙領先的預言’，真不知道我們的老校友最後會有什麼樣的結局啊。”張校友感歎說。

在得知筆者又在重新撰寫這本關於李源潮的新書時，張校友在中國農曆春節期間打來電話，說2010年之前的李源潮應該還是我們了解的那位“老校友”。至於2010年之後的李源潮，張校友沒有多談，只是郁悶而沮喪向筆者反問道：

“如果當年‘老校友’也留學美國了，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嗎？”

筆者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無論是個人命運，還是中國政局，我們都無需用假設或虛擬語態來解答。

他是曾慶紅的傳人？

一位曾跟李源潮在上海團市委有過短暫交集，後來又在上海市府任職的知情人士，五年前曾告訴筆者，李源潮在上海政壇一直被視為“曾慶紅的傳人”。

筆者當時對這一說法並不認同，畢竟李源潮與曾慶紅的仕途有天壤之別。在筆者看來，曾慶紅是從上海起家，靠著他的政治智慧或者說是政治權謀登上中共權力頂峰的。

曾慶紅是“太子黨”，是“石油幫”，又屬於“上海幫”，更被稱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被廣泛認為是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核心智囊，同時又大力輔佐了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他還十七大上“以退為進”讓同是“太子黨”出身的習近平成為“王儲”。

有人稱他“三代帝師”，也有人叫他“權術大師”。他在中南海的權力圈中縱橫捭闔，在江湖的幕後運籌帷幄；他的狡詐和智謀，他的手段和謀略，既讓人佩服，又令人生畏；他毀譽參半，他也樹敵無數。

相比之下，李源潮則大不相同，他雖然跟中共諸多派系如“團派”、“上海幫”、“太子黨”等都能搭上邊，但他卻沒有自己的政治根基：上海不是他的地盤，團中央不是他的政治發源地，國新辦和文化部更不是他的政治根據地，只有江蘇七年他才打下自己的政治基礎。

此外，在曾慶紅眼中，李源潮也不是他所看中的政治傳人。早在團中央擔任第四把手，卻一直不受重用的李源潮，曾有回上海老家重新再來的打算，但卻遭到當時在上海灘擁有足夠話語權的曾慶紅的強烈反對。從這一點看，即使李源潮想當曾慶紅的傳人，也不被曾認可。

然而，殊途同归卻是很多中共高官的最後政治走向。曾慶紅擔任過中組部長，李源潮也步其後塵；曾慶紅擔任過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也坐上這個位置；當時的曾慶紅權大無邊一心想當太上皇，後來的李

源潮也雄心勃勃想當國務院總理，從這一點看，跟曾慶紅亦步亦趨的李源潮，真是曾慶紅的政治傳人。

更不可思議的是，此時此刻，不管是曾慶紅，還是李源潮，他們都同處在一個自己早已無法把握和控制的絕境之中。

隨著大老虎周永康的落馬，有關曾慶紅本人和其家族的腐敗傳聞不時被曝光，而曾與周因“石油幫”而結下的政治聯盟，後來也變成公開周案的阻力。當初在中南海呼風喚雨的曾慶紅，現在已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而李源潮的政治處境更是凶多吉少，在令計劃和周永康政變陰謀敗露後，李源潮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也露出馬腳，他的“江蘇幫”正遭到清算，他們的心腹和馬仔幾乎全軍覆沒，他的腐敗傳聞更是令人震驚。

更加諷刺的是，有人總結出曾慶紅和李源潮的處境，跟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三大老虎被抓的過程，非常相似：先是流言四起，接著親信及家人出事，隨後公開露面或發文闢謠，然後國內媒體隱射，接著便是官方公布，最後媒體展開“扒皮”運動。

甚至在一些媒體和輿論的預測中，曾慶紅和李源潮，已“穩居”2015年打大老虎名單的前兩位。

我們不知道李源潮的政治命運會怎樣。但筆者想通過這本書向讀者傳遞的信息是：以2010年為界線，之前的李源潮是我們都熟悉的，之後的李源潮則是我們完全陌生的。

此書若能讓讀者重新認識一下那個越來越陌生的李源潮，筆者也就完成了重新認識李源潮的這個特殊過程。（劉方遠）■

第一章 親生父母

李源潮的親生父母都是老革命，都是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參加革命的。至今，他們在蘇北地區仍很有名氣，其名聲也跟後來當上江蘇省委書記的兒子不相上下。

介紹李源潮的父母，其實不應該加上“親生”二字，但考慮到本書主人公少年時代的特殊經歷，只有“親生”二字才能突出高於一切的血緣關係。而這個關係則決定著他的成長過程，更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命運。

父親李干成

1950年11月20日，李源潮在江蘇蘇州出生，那時他的父親李干成擔任中共蘇州地委書記。

說起李干成，在蘇北地區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有人說，“他的名字起得好，干成干成，幹什麼事都能成。”可李干成的名字，是參加革命後才改的，他的原名叫李學斌，也叫過李慈。

1908年11月，李干成出生在江蘇淮安漣水縣紅窯鎮龍興村一個殷實的富農家庭。五歲時，父親請了個塾師，教他識字讀書。不久，地方上辦起了洋學堂——龍興小學，父親又送他到那裡讀書。此後又在朱樓小學、韓莊高等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後，他到揚州上中學。



李干成

1926年，李干成考入上海建設大學，成為家族中第一個考上大學的“才子”。李姓宗族中素有威望的長者，看到他將來可望是宗族中有作為的人才，決定由李族祠堂出資供其到上海讀書。中共淮安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馬新文撰文介紹說，這期間，李干成結識了匡亞明、宋西平等進步青年，閱讀進步書籍。

1929年秋，在宋西平的介紹下，李干成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他被調到閘北區，任共青團閘北區委宣傳部長，具體負責聯繫各個大學宣傳工作。當時閘北區的活動中心在中華藝大，校長陳望道。校內進步人士很多，黨團力量比較強。除了藝大外，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持志大學、法科大學、勞動大學及附屬中學等大中院校都有黨團組織。李干成先後到過這些院校，並與這些院校黨團組織

保持著密切的聯繫。每逢節日都舉行紀念活動，組織和發動群眾，進行集會、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等。

1930年春，李干成轉為中共黨員。由閘北區團委調至共青團江蘇省委做巡視工作。在巡視泗縣等地的工作後，他赴徐州向中共徐海蚌特別委員會（簡稱徐海蚌特委）匯報工作，特委鑒於當時地方缺少幹部，經請示團省委同意，就將他留在徐海蚌特委工作。隨後，徐海蚌特委派他到宿遷擔任縣委書記。

1930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組織工作會議，提出“黨的組織在武裝暴動時，要完全軍事化”。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團、工會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統一成立各級行動委員會。隨之，宿遷縣行動委員會成立，李干成任行委書記。同時決定成立紅15軍第3師，由他任政委，籌編紅軍武裝。

此間，李干成發動了洋河暴動，因叛徒告密，暴動失敗。不久，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會後各級黨、團、工會組織重新恢復。李干成從宿遷調到邳縣，任中共邳縣縣委書記。爾後，他被調任共青團徐海蚌特委書記，兼中共徐海蚌特委青年部長。

1931年初，中共徐海蚌特委撤銷，分別成立徐州特委、長淮特委、海州特委。李干成被調回共青團江蘇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先後擔任共青團吳淞區委、滬中區委書記。夏秋之間，他又調任江蘇省委巡視員，先後到揚州、淮陰、連雲港等地巡視工作。巡視結束後，共青團中央任命他為共青團河南省委書記。

1932年春，中共河南省委遭敵破壞，團中央將李干成調回，派到共青團江蘇省委工作。團省委又任命他為團滬西區委書記。不久，李干成又調回共青團江蘇省委做巡視員，負責聯繫共青團滬西區委和特區區委的工作。

獄中帶頭絕食

1932年11月1日，李干成受命去滬西參加會議，研究工作。由於叛徒告密，會場遭敵包圍，李干成與團區委書記陳同及新任中共滬西區委書記孔昭辛等人被捕。

在龍華警備司令部，國民黨當局對李干成等進行會審，判處李干成有期徒刑七年。判決後，李干成被關押在漕河涇國民黨政府的“模範”監獄——江蘇第二監獄。

漕河涇監獄建築設計形同“八卦陣”，整個是個大圓形，裡面呈放射狀，設甲、乙、丙、丁、戊、己、庚七個號子，一條走廊。為了防止政治犯在獄中搞革命宣傳，獄方把政治犯和其他案犯分開關押。甲、庚兩個號子專門關押政治犯。李干成被關在甲號子裡，被關在一起的同牢難友有：林李明、張愷帆、孫海光、陳一誠、桂篷、葉天池等。從早到晚，他們還要拖著沈重的腳鐐，在看守的監視下被強迫到獄中工廠幹活。

開始，黨組織經常派一位姓彭的同志到獄中探望他，給他送來一些藥品和衣服等用品。後來這位同志寫信告訴李干成外面情況很複雜，他將離開上海。從此，李干成與中共黨組織失去了聯繫。

當時，被關押的政治犯經常遭到獄警、看守的嚴刑拷打，甚至隨時可能被秘密殺害，生存權受到極大的威脅。1934年夏秋之間，李干成等向監獄當局提出強烈抗議，要求：開鐐；准許使用紙筆；改善伙食；每天都要放風。如不答應上述四點要求，就進行集體絕食。國民黨當局沒有答應。當即李干成他們的絕食鬥爭就開始了。第一天，外役把飯桶挑來，大家一動也不動，外役只好把飯挑回去。第二天大家仍不進食，看守長到各個號子前吼叫一陣，強令大家吃飯，可是誰也不理。第三天絕食鬥爭仍在繼續，送來的水也不喝一口。到第四天，敵人開始動武了，把李干成等為首的十幾個人拖出號房嚴刑拷打，把他們雙手反綁著，懸吊在梁上，腳上還繫著幾十斤重的鐵鐐，看守照著他們的脊背、屁股，你一拳他一腳地推來搡去，使他們吃盡了苦頭。

獄方的鎮壓沒有奏效，消息傳出後，上海律師公會、上海人權保障同盟等社會團體，都派人來獄中調查。並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獄方非常被動。在強大輿論壓力和李干成他們的堅決鬥爭下，獄方被迫答應政治犯們提出的要求。受到絕食鬥爭的打擊，獄方就改變了手法，藉口監獄人滿，決定把政治犯中最不安穩的分子轉移到蘇州陸軍監獄，理由是：你們是淞滬警備司令部寄押在這裡的軍事犯，你們應該到軍事監獄去。

1936年6月，獄方要將李干成等50人解到蘇州陸軍監獄。這些政治犯們拒不上囚車，從天不亮鬧到七八點鐘，才被強押上囚車。被一個連的憲兵押解著，兩個兩個銬在一起，直開上海北站。到了北站，50名政治犯拒絕上火車，向群眾演講，宣傳：“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國家危急存亡，國民黨政府不抗日，還要把我們關在這裡！我們要求到前線去，抗日救國！”

到了蘇州，獄方對李干成等看管得更加嚴厲，動輒給予軍棍拷打等野蠻殘暴的“特殊待遇”，李干成等組織了一次又一次鬥爭，每次都遭到獄警的毒打。

1936年冬，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的烈火迅速燃燒起來，全國人民的抗戰情緒更加高漲。為合作抗日，國共兩黨經過談判，國民黨當局接受了立即釋放關押的共產黨員和其他政治犯等條件。

一直要求恢復黨籍

1937年8月19日，李干成、孫海光、朱月山在國民黨蘇州陸軍監獄同時被釋放。出獄後，他們一起到朱月山的族弟朱俊生家，朱俊生把李干成等人藏在家中，設法幫他們理髮、洗澡，還為每人換洗了衣服。躲了幾天後，在一天夜裡，他們各自回到家中。李干成到家後，聽說國民黨特務活動還很凶，便隱藏在家一直沒有露面。

9月初，陳亞昌聽說李干成已經回來，便找上門問李干成父親，其父一口否認。一兩天後，陳亞昌又到李家，對李干成父親講："現在統一抗日，特務不抓人了，讓干成出來組織群眾抗日吧。"李干成剛出獄，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加之對地方上的情況也不了解，所以陳亞昌連續來了兩次都沒有見。

陳亞昌第三次上門，李干成才與其見面。不幾天，陳亞昌又和萬金培一起來到李家，向李干成介紹了他們自己及漣水地方上的一些情況。

李干成本想去延安解決組織問題，就在這時宋振鼎從武漢返淮後來到漣水李干成家，告知徐烈（張愛萍）、吳緘之（吳仲超）的意見：蘇皖地區有10萬民眾武裝，可以組織抗日，要回到蘇北老家去，在家鄉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救亡團體。失掉關係的或從監獄中出來的同志不要亂找，首先把工作搞起來，黨組織是會主動找他們的。李干成聽了這個意見後，確定在本地搞抗日救亡活動。宋振鼎還和淮安（今楚州）、淮陰、泗陽等縣的一些負責人取得了聯繫，召開秘密會議，傳達指示。經過各縣代表的商討，決定籌備成立蘇北抗日同盟總會。

1938年1月下旬，各區代表50多人在灰墩小學召開大會，成立"漣水抗日同盟會"。會上，李干成作了關於成立漣水抗盟意義的報告，宋振鼎作了抗戰形勢的報告，通過了漣水抗盟的組織章程。推選李干成、萬金培、陳亞昌、陳書同、王伯謙、林士鈞、朱啟宇、薛味五、薛華甫、左鶴翔、聞金門11人為理事會理事，李干成為理事長，陳亞昌、萬金培為常務理事，聞金門為秘書。

1938年3月，李干成等自籌路費，派陳書同到武漢找黨，想恢復組織關係。陳帶著《蘇北抗日同盟總會章程》和工作報告，向中共長江局駐武漢辦事處負責人董必武匯報情況，要求黨組織派人來蘇北領導抗日工作。董必武聽了匯報後指示：第一，蘇北地處抗日前沿，要抓緊時間組織動員人民，抗日要依靠民眾，只要團結民眾，就有辦法抗戰到底；第二，黨組織在武漢也很缺乏幹部，抽不出幹部去蘇北，八路軍已去山東，蘇北離山東近，可以主動和山東黨組織取得聯繫。

漣水抗日同盟會根據董必武的指示，在理事長李干成的領導下，公開進行各項抗日救亡活動。為了培養抗日骨幹，漣水抗盟和蘇北抗盟先後在灰墩和金城庵舉辦兩期幹部訓練班，每期三四十人。學員都是從各縣抗盟中挑選出來的積極分子，有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宋振鼎、李干成、萬金培、陳亞昌等親自給學員講課，教學內容主要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游擊戰爭"、"抗日群眾運動"等。到1938年夏秋，漣水抗盟成員已發展到220多人。

1939年初，李欣、李干成、孫海光來到沂水縣大王莊，見到了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組織部長程照軒，匯報蘇北抗日工作，同時要求解決黨籍問題。程照軒要李干成、孫海光寫個申請恢復黨籍的報告給他。當程照軒看到李干成曾任過共青團徐海蚌特委書記、共青團河南省委書記、共青團江蘇省委巡視員時，就對李說："對你這一級幹部，我們分局無權恢復你們的黨籍，非經過中央不可，除非重新入黨。"

對於重新入黨，李干成、孫海光不同意，認為坐了五年牢，難道連黨員都不能做？這樣，他們只好在大王莊坐等延安覆電。等了一個多月，沒接到覆電，程照軒一兩星期來與他們見一面，李、孫認為以前找不到黨，現在找到又不睬，就盯著程照軒不放。程說他也沒辦法。只好等延安覆電，最後他又說："你們還回蘇北工作吧！延安覆電便通知你們。"他們回來時在鐵佛寺見到了中共蘇皖特委代理書記、組織部長李浩然，李浩然也叫他們重新入黨，否則無法解決。

打響漣水抗日第一槍

李干成回到漣水後，與蘇皖特委派出的張芳久、高興泰、戴曦三人接上了聯繫。張芳久等人到漣水

後不久，就進行了分工，張芳久到淮陰、泗陽，高興泰到淮安開闢工作。戴曦留在漣水，在李干成、朱慕萍等人的幫助下，很快認識當地一批熱心抗日救國的各階層有影響的人士，培養和發展進步青年入黨。

此時，中共皖東北特支書記江上青派朱伯庸赴山東分局匯報情況，請求派幹部到皖東北工作。朱伯庸到鐵佛寺蘇皖特委時，聽說李干成等剛從山東分局回來，就趕到漣水李干成家（1932年朱伯庸曾在李干成領導下工作，對李比較了解），要李到皖東北開展工作，李也同意了。就在準備動身的前一天晚上，陳亞昌為李干成送行，再三挽留李。這時，日軍已佔領了淮陰、漣水等地，交通封鎖，路上無法通行，就未去皖東北。中共山東分局也帶信給李干成，信中要李協助張芳久等發展黨組織，搞武裝，在淮漣建立八團。根據山東分局的指示信，李干成確定留在漣水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漣水淪陷後，國民黨漣水縣政府和守城部隊不戰而逃，漣水城鄉一片混亂。李干成等人抓住有利時機，把周圍有志抗日的青年都動員組織起來，將抗日宣傳活動轉入武裝鬥爭。漣水淪陷之前，李干成就做了武裝鬥爭的準備。

在成立抗日義勇隊之前，李干成在楊和庵小學召開地方開明人士座談會，爭取他們對抗日工作的支持。會後，開明紳士劉一仁拿出幾支步槍支持義勇隊，在他的影響下，兒子劉立剛、劉立毅都參加了抗日工作。

1939年3月上旬，李干成、陳亞昌、陳鳳洲等在紅窯龍興寺成立漣水抗日義勇隊，隊員30多人，李干成任隊長。3月12日，為集中力量進行有效的游擊戰爭，獨立營和義勇隊在紅窯鄉龍興寺會合，合編為"漣水縣抗日義勇隊"。公推李干成為隊長，陳亞昌為副官，林士鈞為參謀。

4月5日，一個班日軍強迫100多民工在魯渡修築公路，漣水抗日義勇隊決定伏擊這批日軍。隊員們首先對空鳴槍，驚散民工，日軍邊還擊邊集中向漣城方向逃跑，行到離魯渡不到一里的地方，進入李干成領導的義勇隊伏擊圈，隊員們數槍齊發，日軍驚慌失措，逃到魯渡東邊一農戶屋裡固守待援。第二天，李干成、陳亞昌、林士鈞率領全體人員向敵攻擊，鹽河兩岸民眾數百人聞訊參戰，將這股日軍四面包圍，攻打一天一夜。因當時武器差，又是初戰，無法接近敵人。第三天拂曉，漣水日軍趕來增援，這股日軍才狼狽逃回。

1939年6月，根據蘇皖區黨委的指示，蘇皖三地委副書記張芳久將淮陰、漣水兩縣抗日義勇隊和淮安民眾自衛隊在漣水成集合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隴海南進支隊第八團，由張芳久任黨代表（7月下旬，張芳久在淮陰縣漁溝遇害，即由萬眾一任政委），吳覺任團長，陳書同任副團長，夏如愛任參謀長，李干成任政治部主任，高興泰任政治部副主任，陳亞昌、林士鈞任副官處長。八團的成立，為迎接八路軍主力部隊東進淮海，建立蘇北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1940年8月，黃克誠率八路軍主力部隊東渡運河，開闢淮海地區。9月18日，蘇皖區黨委書記金明率機關幹部於皖東北進入淮海區，直接領導淮海區各縣的工作。蘇皖區黨委在沭陽錢集召開士紳座談會和各界代表會議，成立淮海區專員公署，推選八路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吳文玉（吳法憲）為專員。因工作需要，李干成調任淮海專員公署民政處長、糧食處長，從而走上新的崗位。

恢復黨籍，指揮反掃蕩

直到1942年李干成才得以恢復黨籍。這時距離走出國民黨監獄已六年了。

對李干成在家鄉建立抗日根據地這段歷史，在原泗陽縣黨史辦主任胡茂功的文章中有詳細介紹。1940年，泗陽縣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初稱泗陽縣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秋，陳毅代軍長親自發動和指揮的程道口戰役取得勝利後，將沭陽縣城南部分併過來，改稱泗沭縣抗日民主政府。1942年秋，因縣委書記郭光裕病重，淮海區黨委派李干成到泗沭主持縣委工作，10月正式調任泗沭縣委書記兼任縣獨立團政治委員，幹部群眾都稱他"政委"。

1942年10月，李干成初任泗沭縣委書記。泗陽縣是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江蘇省第七專員公署專員兼常備第七旅旅長王光夏的老家，號稱"模範縣"，國民黨勢力很強。王光夏又長期任泗陽縣長，不少鄉保長和王光夏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為了搞好民主建政工作，縣委決定先試點，得出經驗，在面上推廣。李干成經常到點上，活動在劉圩、徐圩、張圩一帶，宣傳發動，物色積極分子，挑選候選人。

1942年11月14日，日偽軍對淮海區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掃蕩"。14日下午，日軍華北派遣軍以第17師團藤原聯隊為主，糾集偽軍第36師李實甫部，計8000餘人，由泗陽、淮陰、漣水以及新安鎮等地分九路出動，合擊淮海區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沭陽縣的小胡莊、張圩，妄圖一舉撲滅淮海區首腦機關，

進而摧毀淮海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淮海區黨政軍機關、民兵和各分散部隊積極組織人員抵抗，並迅速跳出了敵人的合圍圈，順利地轉移到泗沭縣。

1942年是抗日根據地最艱苦的一年。由於日本頻頻“掃蕩”，加之碉堡戰略，根據地被分割成幾塊，機關、軍隊生活供應都成問題。淮海區黨政軍機關駐在泗沭，只有從泗沭取得供應。李干成和夏如愛共同努力，組織強有力班子，加強公糧公草徵購，保障淮海區黨政軍機關供應。加強對工商戶統戰，穿城陳士揚既開布疋百雜貨店，又開大酒糟坊。經過動員獻出兩千餘塊銀元。並利用陳士揚在敵佔區關係，購買醫藥、紙張、布疋、生活用品，以保證對機關學校、軍隊的供應。

淮海區黨政軍機關轉移到泗沭後，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則靈活轉移，分散堅持，利用有利條件，積極打擊敵人。淮海軍分區主力一部於小店子、塘溝，馬渡一帶相機打擊北犯敵人。從1943年1月5日起，較長時間，泗沭縣軍民在李干成領導宣傳發動指揮下，展開了對日偽軍的交通破擊戰，普遍開展了“破”、“拆”、“打”、“動”的運動。



1977年，李干成（右二）、呂繼英（左一）與淮河大隊老戰友郭靜軒（右一）在淮陰地委第一招待所門前留影。

1943年3月17日，日偽軍從南北夾擊泗沭中心區，群眾傷亡比較多。當天日偽軍被擊退以後，縣委、縣政府組織黨員幹部做好“掃蕩”後的安撫工作。李干成深入鄉村對受害群眾進行安慰和對傷員進行救治。

1943年秋，李干成任沭宿泗三縣中心縣委書記，但他的家仍在泗沭，夫人呂繼英時任淮海區參議會秘書，正身懷六甲，行動不便，難以跟隨頻繁轉移奔波，組織上把她安排在張圩鄉張正富家打埋伏近兩年。

這個在泗沭農村出生的男孩，是李干成和呂繼英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取名叫李偉之。

韓戰爆發，李援朝出生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1946年6月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在佔領兩淮地區後，國民黨整編第74師和28師兩次進攻漣水城，李干成領導淮漣地區幹部群眾堅持原地鬥爭，組織軍民支援前線，作出了重大貢

獻。

國共戰爭進入中共戰略反攻階段後，李干成帶領淮漣軍民配合主力部隊攻佔了大片土地。淮海戰役打響後，李干成任華中支前司令部副政委，共組織蘇北、江淮兩區支前擔架1.5萬副，大小車8.25萬輛，牲畜1.8萬頭，船3400條，出動民工175萬人，供應糧食5773萬斤，為淮海戰役的勝利提供了物質保證。

隨著中共在全國勝利的進程大大加快，華中工委決定，渡江戰役後李干成等去蘇州開展工作。很快，蘇州解放，李干成擔任蘇州行政區首任專員，帶領群眾開展土改、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保障了軍隊繼續南下作戰。

在解放上海戰役中，李干成和蘇州地委、專署一班人，數月內籌糧5150多萬斤，動員輪船、民船5800餘條，確保了30萬解放軍主力、9000餘匹戰馬的供應。

1950年5月，李干成在任蘇州區專員時，有一次常熟的一個鄉在召開農代會時抓住兩個小偷，一名青年幹部強令把小偷的眉毛剃掉，並在身上貼上“賊”字遊街示眾。李干成得知後立即指示要嚴肅組織紀律，及時制止了這種行為。他說，小偷犯法可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剃眉毛、貼“賊”字遊街有辱人格，是違反政策的，要堅決糾正。

此時，朝鮮半島局勢驟然緊張起來。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10月25日，志願軍打響了入朝後的第一仗，拉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蘇州在李干成等領導下，大力開展生產競賽、捐獻和擁軍優屬工作。當時僅蘇州地區就有5782人入伍，同時還募集資金269.27萬元，可購飛機18架。

1950年11月20日，李干成和呂繼英的第四個兒子在蘇州出生，並取名李援朝。據說，因為援朝這個名字叫的人太多，且帶有戰爭色彩，多年後，李干成的這個兒子就“自作主張”，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源潮。

前幾年流傳說，李源潮是在調入團中央後把“援朝”改成“源潮”，原因是中共領導人名字中必帶水等等，從而也顯示出李“有野心”云云。據查李源潮自1983年調進團中央起一直是現在這個名字。所以，有關其改名的傳聞並不靠譜。至於李源潮是在什麼時候改名的，已很難考究。不過，據他的知青戰友撰文講，在蘇北大豐農場下鄉時，他們還叫他“李援朝”。

當上了上海市副市長

1952年4月，李干成調任中共常州地委副書記、代理書記。

同年12月，李干成調任上海市市政建設委員會副主任。次年6月，開始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根據中央交通部的指示，在李干成的主持下，中興輪船公司、海鷹輪船公司成立了公私合營的中興海運公司。

1956年，根據中央防止帝國主義突然襲擊的指示和上海市人大會議“關於發展浦東、興建黃浦江越江隧道的提案”精神，市政建設辦公室提交了《上海市地下鐵道初步規劃》，立刻引起激烈爭議，焦點是上海屬於典型的鬆軟地層，有人認定地鐵不可能搞得起來。李干成力排眾議：“修建地鐵不僅是為了戰時防止空襲，更是為了解決上海將來可能會出現的交通擁堵問題。”這一提議深得市委大多數領導贊同。在隧道建設中，他還組織技術人員赴荷蘭、比利時實地考察，鼓勵“拿來主義”，取人之長，為我所用。如今，黃浦江越江隧道的開通、地下交通網絡的建立，為浦東開發乃至整個上海市的發展都奠定了良好基礎。

1958年12月，李干成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59年，李干成分管上海市交通口的工作。

1962年7月，李干成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1963年，上海市把人口密度最高的蕃瓜弄確定為成片改造棚戶區的試點，在李干成的主持下，經過兩期改造，蕃瓜弄變成了“翻身弄”，成為當時面向世界、展示“新上海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一個窗口。

與此同時，虹橋機場擴建工程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李干成組織帶領廣大建築施工者，僅用短短四個月時間就提前完成了國務院下達的任務。虹橋機場擴建工程是全部用中國自己的力量設計、建設起來的，這在中國民航機場修建史上是第一次。此後，虹橋機場擴建二期工程展開，到1965年6月底，上海第一個國際機場——虹橋國際機場圓滿建成。

母親呂繼英與第一任丈夫李超時

與父親李干成相比，李源潮母親呂繼英的名聲甚至更大些，尤其是蘇北地區，她一直被稱為“女中豪傑”。而呂繼英先後嫁給兩人，當時都名氣不小，尤其是她與第一任丈夫李超時的愛情故事，當時廣為人知。

李超時是誰？官方資料介紹說：李超時，原名李振華，1906年2月1日出生於江蘇邳縣柴莊。李超時七歲入家塾就讀，後轉至姜集高等小學讀書，畢業後考入徐州市江蘇省立第十中學。他學習勤奮，成績優異；為人性格剛強，見義勇為，很受老師和同學們的讚許。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武漢成為當時革命的中心，吸引著全國各地青年。李超時離開學校，奔赴武漢，於當年12月考入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1927年2月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主持這個分校日常工作的是中共早期黨員惲代英。李超時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5月，武漢政府所轄的獨立第14師師長夏斗寅率部“叛變革命”，李超時和軍校同學一起，參加了葉挺指揮的討伐叛軍的戰鬥。在戰鬥中，李超時能打善戰，機智勇敢，受到惲代英的讚揚。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分共”後，武漢形勢發生急劇變化。軍校學員大部分改編入軍官教導團，一部分被派回原籍從事革命活動。李超時受派遣返回邳縣。1928年4月，成立了中共邳縣獨立支部，李超時任支部書記。

1928年7月，李超時遵照中共江蘇省委指示，離開邳縣，前往東海開展建黨工作。李超時領導東海地區的革命鬥爭，得到了中共江蘇省委和徐海蚌特委的肯定。

1926年5月16日，李超時在花果山三元宮內召開秘密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東海、灌雲、沭陽、贛榆四縣黨的領導骨幹70多人。他們利用花果山香期，扮做香客進山，白天遊覽，夜間開會。這次會議，對東海、贛榆、沭陽、灌雲等地鬥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李超時紀念館。

國民黨東海、灌雲兩縣政府奉蔣介石對全國的密令，於1929年6月1日發動大搜捕，包圍並搜捕了各級工會和學校，數十人遭到逮捕，李超時也在被通緝之列。當年7月，省委決定調他至通海地區工作，領導南通、海門、啟東、如皋、泰興、靖江、泰縣、東台等縣的革命鬥爭。

1929年11月，李超時和另一名通海地區的負責人劉瑞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延東的父親）去上海參加中共江蘇省第二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省委召開專門會議，聽取了李超時和劉瑞龍關於通海地區工作和游擊運動情況匯報。省委常委羅邁（李維漢）、李富春、陳雲、廖慕群（何孟雄）、李碩勛等出席了會議，黨中央代表李立三、周恩來、項英等也出席了會議。他們對通海地區的情況非常重視，確定在通海如泰地區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14軍，調何坤、余乃誠、張愛萍等一批骨幹加強紅14軍的領導。李超時根據會議的決定，當即在上海草擬了紅14軍的編組計劃。是年冬，紅14軍軍部組成，由何坤任軍

長，李超時任政治委員，薛衡竟任參謀長，余乃誠任政治部主任。

李超時被殺，僅25歲

1930年2月，李超時主持召開通海區各縣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傳達了中共江蘇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討論了通海如泰地區的政治形勢和工作路線，研究了開展游擊戰爭和紅軍游擊隊的編組、幹部選拔、指揮機關建立、在基層建立黨團組織以及開展政治工作等問題。會後李超時和何坤一起，對通海如泰紅軍游擊隊進行編組。

同年3月，中共通海特委成立，李超時任特委書記。4月16日，何坤軍長在圍攻老戶莊戰鬥中陣亡，5月，省委任命李超時為紅14軍軍長兼政治委員。6月，省委又派張世傑來紅14軍工作。李超時和張世傑一起著手整編部隊，按照中央蘇區正規軍的編制，將在通海一帶活動的第一支隊改編為第2師，將原來在如泰地區活動的第二支隊，改編為第1師。經過整頓後，紅14軍的戰鬥力得到了提高。

1930年8月3日，李超時親自指揮，在黃橋發動了總暴動。參加戰鬥的除紅14軍1師外，還有武裝農民五萬餘人。最後，由於腹背受敵，傷亡很大，李超時不得不下令撤出戰鬥。

黃橋戰鬥失利後，李超時召開了紅軍幹部和如、泰縣委負責人會議，總結了黃橋戰鬥失敗的教訓，研究內部肅反和整頓軍紀問題。9月9日，李超時帶領部分紅軍在鎮濤區田家鋪召開群眾大會，突然遭到敵人襲擊，損失很大。此後，國民黨加緊“清剿”，並派省保安處長親自駐黃橋“督剿”，紅14軍被迫化整為零，分散艱苦打游擊。

1930年10月，李超時奉命回省委參加反“立三路線”的鬥爭，以後就留在中共江南省委任外縣工作委員會委員，後又任省委巡視員。11月省委又派李超時到浙南，撤消了浙南特委，重新恢復了永嘉、台州兩個中心縣委。

1931年6月23日，李超時到徐海蚌地區巡視工作，他和妻子呂繼英一上火車就發現有特務盯梢，車到鎮江，兩人剛下車，就被盯梢的特務截住，軟禁在鎮江輪船碼頭萬全樓旅館內。李超時乘特務防備疏忽，迅速銷毀文件，拉著呂繼英奪門而出。此時大批軍警趕來，又被捕，押至鎮江公安局偵緝隊看守所。

在刑庭上，李超時一口咬定自己叫張文生，雖然遭到嚴刑拷打，也沒能使他屈服。隨後，特務欺騙呂繼英說：“你男人一切都承認了，你為什麼還不肯說。”呂繼英說：“他已經說了還問我做什麼？”特務又故意把他倆帶到一間空房裡說：“你們兩人好好商量商量，是招還是不招。”說著把門帶上，躲在窗下偷聽。呂繼英看到李超時腳拖大鐐，遍體鱗傷，心疼萬分，問道：“敵人是怎樣折磨你的。”李超時堅強地說：“這些不要問，酷刑嚇不倒我。”接著用手勢告訴妻子：認識他的壞人較多，估計為革命犧牲的可能性很大，鼓勵懷孕在身的妻子更堅強。暗示妻子如能把孩子生下來，要好好撫養，長大了交給黨，呂繼英頻頻點頭表示領會他的意思。

1931年9月19日，李超時在鎮江北固山刑場槍斃，當時，他才25歲。有關李超時的婚姻狀況，除了呂繼英和未出生的孩子外，無法從官方資料找到更多線索。不過，有知情者透露說，呂繼英是李超時的第二個妻子，第一個妻子在17歲那年嫁給李超時，但只在一起生活了三天，李超時就再沒有回來過。第一個妻子一輩子未曾改嫁，孑然一身。

知情者還透露說：“李超時後來又認識了一個新女性，並結婚，後在李超時被槍決後釋放，解放後在陳毅作媒下，再嫁於原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得子李源潮，此子後任江蘇省委書記，風頭正健，2001年至江蘇履任，即往鎮江北固山麓祭奠，其中深意為外人不所知也。 ”

這位“新女性”就是呂繼英，也是李源潮的母親。

那麼，呂繼英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她和李超時所生的孩子又是誰呢？

李呂戀遭冷嘲熱諷

當地媒體介紹說，呂繼英是江蘇海州地區重新建黨以後發展的第一個女共產黨員，曾與李超時、惠浴宇、呂鎮中等一起，參加海州地區黨組織的創立活動，她組織海州地區婦女運動，發動救國救亡的學生運動，領導著名的雲台山大村扁擔會暴動。她是1929屆江蘇省海州中學校友，是海州中學歷史上的一代英傑。

公開資料顯示，呂繼英1911年出生在江蘇沭陽縣吳集大呂莊的一個書香門第。1928年，17歲的呂繼英就考入了當時海、贛、沭、灌最高的學府——東海中學。在校期間，她接受了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思想。思想進步的呂繼英積極參加學生宣傳隊奔赴縣鄉演講，宣傳“禦外侮、伸民憤、保國權”，提出“抵制日貨、與日斷交”等口號。

1928年7月，李超時、宋綺雲兩人遵照中共江蘇省委指示，來到江蘇海州開展建黨工作。惠浴宇根據東海特支的要求，首先成立了東海中學支部，發展了呂繼英等一批青年學生入黨。他們經常以郊遊作為掩護，到海州城外，在白虎山、孔望山、雙龍井一些地方一起學習革命文件，討論革命形勢的發展，研究下一步如何開展革命活動。為了更好地發動群眾，呂繼英和馮若愚在海州二營巷借用別人的三間房屋，開辦婦女識字班，又把識字班開辦到花果山下大村，利用節假日步行前去講課。呂繼英還組織共青團小組進行學習，她們都有秘密代號。呂繼英的代號叫“C1”，就是C組1號的意思。李超時經常帶來許多書籍給呂繼英學習，其中有一本蘇聯出版的《中國少年先鋒隊》，對呂繼英的影響很大。呂繼英那時就成為江蘇省委的聯絡員。

惠浴宇在回憶錄《朋友人》中則披露，原來李超時與呂繼英談戀愛，還遭到他們這些戰友和部下的“破壞”：

李超時同志是我尊重的領導人，也可以說是我的革命引路人之一。雖然是萬金培同志介紹我入黨的，但我早期在海州參加的革命活動，一直是在李超時的指導下進行的。那時我們年輕，比較單純，李超時年紀比我們大不少。來海州不久，他就和一位女同志談戀愛。我們看不慣，革命鬥爭那麼緊張，你們還在卿卿我我，於是和呂鎮中、武同儒這些同學和他搗亂。從雲台山開會下來，我們跟在後面盯梢，人家願意兩人單獨相處，我們偏偏不走，夾在中間起鬨……冷嘲熱諷話說得很難聽。後來我們成熟了，理智了，再也不會幹這樣的傻事了。

……1931年6月26日，江蘇省委派李超時到徐、海、蚌地區巡視工作，呂繼英又和李超時一起奔赴徐州，就被敵人抓住。1931年9月19日，李超時被殺害在鎮江北固山上。

同母異父的兄長

2008年12月27日，江蘇省海州高級中學校史館舉行“海中三女傑”塑像莊嚴揭幕。

三尊青銅人物雕像，分別是呂繼英，馮菊芬，馮若愚。“三女傑”之一馮若愚的兒子周永卓在《連雲港日報》發表文章《母親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紀念母親誕辰99週年。文中有一段介紹了呂繼英和兒子李鐵城：

直到1937年，呂繼英才和六歲的兒子李鐵城走出監獄和反省院。此時，　抗日的烽火已燃遍祖國大地。呂繼英攜子又回到沭陽老家教書，恰逢母親馮若愚也攜七歲長子周永亮“跑反”來到沭陽教書，兩姐妹相逢，悲喜交集。教書之餘，兩組妹經常徹夜長談，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切齒痛恨，愈加擁護共產黨全民抗日的主張。不久，呂繼英去上海找到了黨組織，又投入到黨的懷抱。

呂繼英帶著兒子李鐵城再次到上海，除了找到黨組織外，後來又在陳毅的介紹下，與李干成結婚。有關呂繼英和李超時的兒子李鐵城，也就是李源潮同母異父的兄長，媒體報導很少，僅有以下幾條信息：

2008年4月4日，江蘇碾莊鎮超時小學揭牌儀式在原碾莊鎮才莊小學校園內隆重舉行。報導稱，“李超時將軍之子、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鐵城”參加了揭牌儀式。

檢索人民大學官方網站，已無法查到李鐵城的資料。不過，網上資料顯示，李鐵城曾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中國企業家協會下屬的“中企協培訓中心”任教授。

江蘇“鎮江烈士陵園”資料顯示：2002年4月5日，省委書記李源潮在市委書記史和平等陪同下來陵園祭掃先烈，並參觀烈士紀念館。同年12月22日，紅14軍軍長李超時之子李鐵城全家，在民政局長戴善民陪同下參觀紀念館。

李源潮和李鐵城在同一年到“鎮江烈士陵園”祭掃先烈，因為李超時將軍之墓就在鎮江烈士陵園。此外，2006年4月5日，李超時紀念館在碾莊鎮才莊村落成時，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向將軍墓敬獻花籃。

幾年前，江蘇省鎮江市一名慈善會工作人員因為到省紀委信訪辦上訪，遭到“一個大惡棍”粗暴對待後，憤然在網上發表文章，其中一段講的就是李源潮家的“複雜關係”：

“李源朝呀李源朝（原文如此，應為“潮”），你使用了這樣的幹部守衛信訪大門，誰還會再來。我曾經訪問過你的媽媽呂繼英、你的爸爸李干成、和你的兄長李鐵城有過交往，你竟精選出這樣的惡

棍，對付人民群眾……”

這也是李鐵城與李源潮的確是同母異父的兄弟的旁證。

2009年9月29日上午9時，江蘇省連雲港市隆重舉行革命紀念館暨隴海公寓復建開工儀式。李鐵城也是特邀佳賓之一。

據連雲港市委機關網站報導：出席開工儀式的特邀佳賓有：陳小魯（陳毅元帥兒子）、粟惠寧（粟裕大將女兒）、劉念遠（谷牧副總理兒子）、李鐵城（李超時烈士兒子）、萬明明（萬毅將軍兒子）、張海萍（張文海省長女兒）等中共元老的家屬參加。

第二章 兄弟姐妹

用張春橋的話說，“上海是黨的誕生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文革”爆發後，李源潮的父親處理過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被當成人質，最後在“一月風暴”中被打倒。

李源潮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文革”中李家遭受衝擊，父親被關押，母親被趕到農場，子女們也都上山下鄉。幾十年後，除了李源潮當官外，他的兄弟姐妹都很普普通通。

父親拒上賊船被打倒

1952年12月，擔任中共常州地委代理書記的李干成調到上海，主管市政建設。李家從常州搬到了上海，夫人呂繼英也調到上海市建築公司擔任領導。六十年代初，李干成升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後，呂繼英也擔任建築公司黨委書記。1954年，呂繼英當選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不久，李干成被打倒，呂繼英被趕到農場勞動，李家人被趕出了康平路大院。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兒子陳小津在《我的“文革”歲月》一書中談到了李干成：

……李干成也是一位鐵骨錚錚、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輩革命家。……李干成調到上海，先後擔任市政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交通工作部部長，基建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1962年，他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在我父親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數十年。



安亭事件。

“文革”初期，張春橋一夥考慮“三結合”問題，曾經想拉攏李干成與馬天水、王少庸一道上他們的賊船，條件是必須揭發陳丕顯和曹荻秋“三反言行”。李干成嚴辭拒絕，隨即被打倒，長期關押在少教所。專案組人員抓住李干成1931年被捕問題大做文章，對他進行瘋狂批鬥和審訊，逼其承認是“叛徒”。李干成的這段歷史問題，1941年在華東整風運動中已作出明確結論，並恢復了他的黨籍。而審訊人員仍不放過他，採取了“車輪戰”、“蘑菇戰”。倔犟的李干成毫不屈服，直到被折磨得中風倒下，神智不清達20多天，報了病危。李干成在少教所關押期間，還患上了肺結核，不得不入院治療。直到1974年，李干成才得以重見天日。

揪來揪去

1966年11月27日至12月9日，上海發生了震驚全國的《解放日報》事件。

11月27日，“紅衛兵上海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要求上海郵電局報刊發行處，代為發行刊載有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文章的《紅衛兵報》（該報是紅革會主辦）遭到拒絕；又要求把《紅衛戰報》和《解放日報》夾在一道發行，又遭到解放日報社拒絕。但“紅革會”還是堅持要隨同當天的《解放日報》同時發行。他們說這期《紅衛戰報》揭發、批判了《解放日報》貫徹執行上海市委的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日報》放毒到哪裡，我們就要消毒到哪裡”。他們揚言要“寸土不讓，寸土必爭”，雙方談判無結果。

11月29日晚10時左右，市“紅革會”一個常委帶領二三百人來到市報刊發行處，再次要求將《紅衛戰報》與《解放日報》夾在一起發行，又一次遭到拒絕。於是他們衝進解放日報社，向報社負責人提了三項要求：（1）《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內一起發行；（2）《解放日報》必須全文轉載《紅衛戰報》的《〈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一文；（3）要把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和市委對報社的指示告訴他們。這些不合理的要求遭到報社負責人的拒絕。於是“紅革會”總部召開常委會議，決定進駐報社，逼迫報社同意他們的要求。

11月30日凌晨1時左右，“紅革會”從各個學校調集大批人員，衝進漢口路274號解放日報社大樓，佔領了樓下的發報間、會議室、禮堂和一些辦公室，並成立了“火線指揮部”。

12月3日早晨，“工總司”和“紅革會”一些人，先後“揪”來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蔣文煥和上海市副市長李干成。他們挾持李干成一起去揪市委書記曹荻秋，結果沒有找到曹荻秋。他們到華東醫院把正在就醫的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揪”到解放日報社，並挾持韓哲一、李干成去“驅散”報社外面的群眾。裡邊“造反派”用辦公桌、玻璃、木條等堵住報社大門，外邊群眾猛力往裡衝，把一張乒乓球桌撞了個洞，造反派就把蔣文煥推到洞口堵，外邊有人打他，並用竹片往蔣身上戳，直到蔣文煥被折磨得面色蒼白，休克過去，報社職工將其急送仁濟醫院搶救。蔣文煥後來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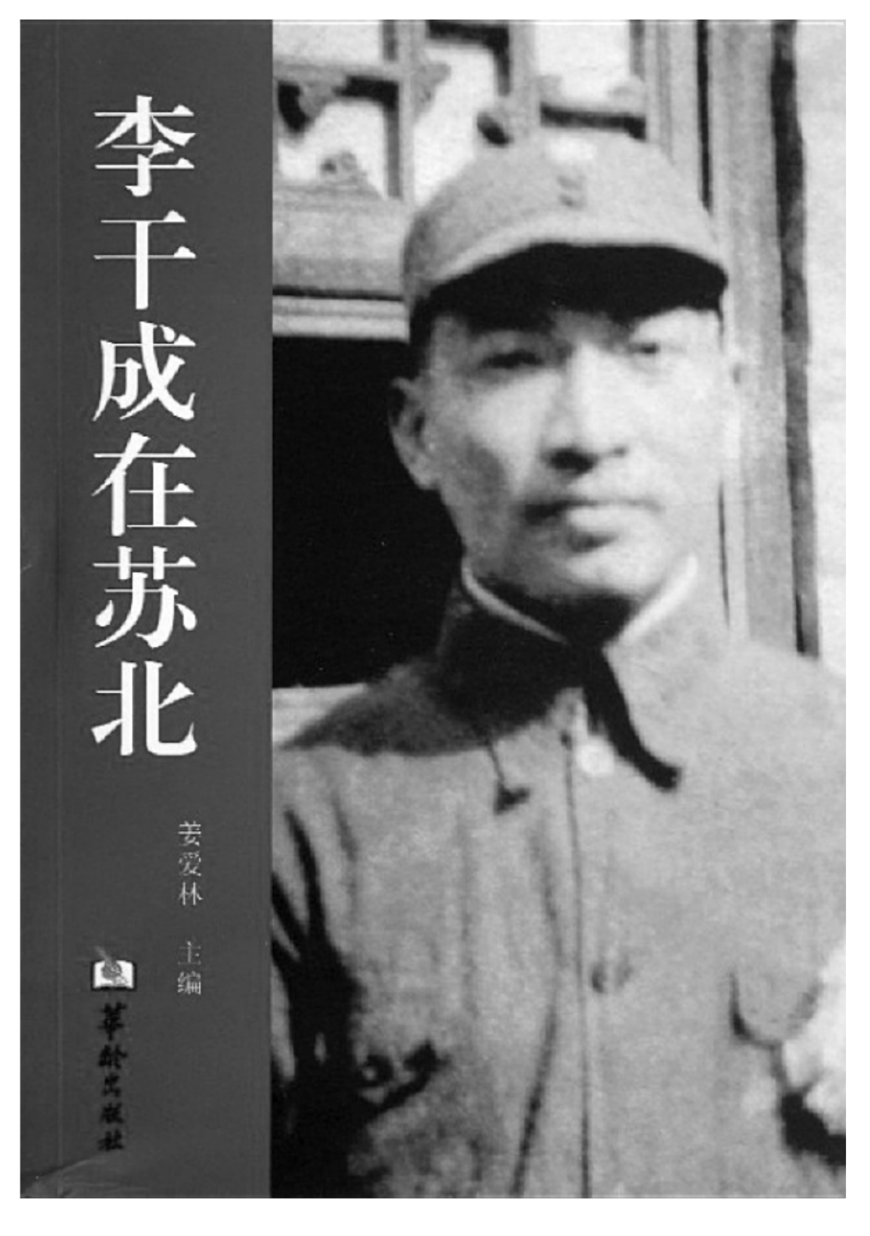
兒子只能看一眼

據長子李仲之說，“文革”初期，他一再問父親形勢將如何發展，父親總避口不談。後來李仲之在一位老人的回憶中，知道這麼一段曲折歷史：“1967年元月初的一個傍晚，天特別冷，我陪研吾同志（原上海市委的一個老人）去趙忍安同志家，見到你父親（李干成）和宋季文同志。後來才知道，那是被‘奪權’之前，中共上海市委的最後一次常委會，只有三個人參加。分別時，干成同志在樓下握著我的手說：‘真是白色恐怖呀，老方，你要照顧好研吾同志。’”

李仲之說，父親是當時與會的三個常委之一，他又要保護老同志，又要對付“造反派”，真是太不容易。李仲之說，現在才理解他老人家當時沈默不語的真正原因。

次子李偉之也曾在撰文中回憶了李家在“文革”期間的遭遇：因父親在“文革”前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自然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一家人被“造反派”從康平路大院趕了出來，住到了復興西路一個資本家的房子裡。同時被趕來的還有解放日報社總編輯等三家人，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落難戶。

到了1967年12月，李干成被“造反派”關押，隔離審查，不讓家屬探望；母親呂繼英被弄到崇明農場去勞動；李家的兄弟姐妹中有的在上學，如李健之和李申初他們；有的下放插隊，如李源潮和李蘇光；李偉之也從學校下放到泰州去養豬。一家人散落東西，家中只剩下一個“造反派”保姆。李偉之的未婚妻出身好，“造反派”不會找她麻煩，李偉之走的時候就委託她多幫著照看一下家裡。後來她多方打聽，才找到父親被關押的地方，但是“造反派”們不讓見面，只允許她送點衣物棉被進去。



《李干成在蘇北》

1970年5月，李干成患腦溢血，被送到上海華山醫院急救。李源潮從大豐農場趕回來，費了好多口舌，“造反派”才同意他進病房探望一下，但是只待了20分鐘就被趕了出來。

1970年李偉之從泰州回到上海，無著無落，他和未婚妻在雙方無家長無親朋好友參加的情況下，辦了個簡單的婚禮，婚後住在復興路的房子裡。

1972年10月，李家接到“造反派”通知，父親李干成再次腦溢血，並懷疑是肺癌，被送到了上海第二結核病防治所。專案組破天荒地允許直系家屬去探望，大家即可知道他的病情有多嚴重。呂繼英聞訊後立即從崇明農場拎著一個小包趕到了防治所，醫院給他們安排了一間小房子，主治醫生直接告訴呂繼英：李干成沒有康復的可能了。

後來，李干成跟兒子李偉之說：“那個時候我怎麼能死呢！死了很多問題就說不清楚了！我要堅持，我相信總有讓人說話、聽人說話的一天，我一定要跟他們（造反派）鬥爭到底！”

1974年剛出院，李干成就給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寫信要求工作，沒有得到批准。直到粉碎了“四人幫”，他才被安排到上海市城建局當顧問，1977年年底到了市政協，才算是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

平反後任市政協副主席

小兒子李申初在紀念父親的《淡去的身影》一文中回憶說：

從解除隔離審查，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中間也有三年多，爸爸因為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始終停留在“文化大革命”初的水平上，只是掛了一個建工局顧問的虛銜，從這段時間開始，爸爸的話漸漸減少，作為子女，我們在家中對政治與社會現象的議論反而逐步多了起來。給我深深印象的，不是父親對當時政治與社會現象的不滿或是抱怨，我從來沒有聽過爸爸對這些事物的任何抱怨，而是他對黨、對事業執著的信念和信心。

……粉碎“四人幫”後，爸爸重新恢復工作，但已然退居二線。崗位變動、身體狀況和年齡，都使得他不再能像從前那樣衝鋒陷陣，但對於變動中的社會，他仍然一如既往，儘自己的智慧和才幹去理解和改造。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李干成獲得平反。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給他和呂繼英補發了“文化大革

命”期間的工資，他全部作為黨費上交了。組織部的同志說：“你再考慮考慮吧，聽說你家裡的小孩‘文革’期間都受了不少苦，要不你拿去給他們分了吧！”李干成想了想，還是把大部分都上交了，只留下了一點給子女們每人都買了一樣東西。李偉之得到了一輛自行車，李源潮和李健之各得一塊上海牌手表……

次子李偉之回憶說：當時我們家裡的傢俱都很破爛，很不像樣子，妻子士蘭就問爸爸是不是能幫著我們添置一套傢俱，也不是要買好的，一般的就行，而且那個時候傢俱也不貴，一套傢俱僅400多元。爸爸不同意，他說：“你們想要生活過得好，就要自己去拼搏，去奮鬥，不要想靠父母。”最後只同意買了個大櫥，還是和士蘭一人出一半的錢。

從“文革”開始被趕出康平路後，李干成一家一直住在復興路。1981年，李干成和夫人呂繼英又搬回到康平路，跟小女兒李蘇光住在一起。在復興路居住時，李干成和兒子李偉之一家生活了十幾年，李偉之說，當時“一家三代其樂融融”，“正是我一生中最難忘、最寶貴的一段時光”！



李源潮的父母。

重新恢復工作後，1977年12月，李干成擔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1979年4月，擔任中共上海市委顧問。1983年4月，離職休養。1993年4月14日，李干成在上海病逝，享年86歲。

百年誕辰，子女高調亮相

李干成和呂繼英共有七個孩子，五個兒子兩個女兒。2008年11月，是李干成誕辰100週年紀念日，中共黨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由淮安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著的《李干成紀念文集》。

官方媒體介紹說：該書通過簡潔的傳略、翔實的文存、感人的回憶，真實再現了一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曲折坎坷而又多姿多彩的革命生涯，生動展示了他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終生的崇高形象。

2008年11月8日，江蘇淮安市委、市政府在漣水縣隆重舉行《李干成紀念文集》首發式。李干成親屬代表李蘇華、李仲之、李偉之、李健之、李申初等，出席首發式。

淮安市委書記劉永忠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對文集首發式非常重視，認為舉辦本次活動有兩個方面意義，一是通過學習李干成的人格品質，倡導廣大黨員同志守住共產黨員的人格；二是通過宣傳共產主義革命事跡，激勵廣大黨員幹部多為老百姓造福。李源潮希望淮安的各級領導幹部繼承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艱苦奮鬥、求真務實的光榮傳統，凝心聚力謀發展，一心一意為人民，始終堅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努力把淮安建設得更加美好，讓廣大老百姓享受更多的發展成果。”

據漣水網友透露，《李干成紀念文集》收錄了李家子女的紀念文章，惟獨缺少四子李源潮。不過，在文集首發式上淮安市委書記已介紹，李源潮對此次活動非常重視，並肯定了父親的人格品質。李源潮的這番高調評論，曾在漣水等地論壇引起網友的議論。

有網友指出，漣水本來在江蘇就是個落後地區，搞這樣的首發式能帶動經濟發展，還是能提高當地的經濟效益？還有網友稱，搞這樣的個人宣傳活動，簡直就是勞民傷財，這些都是淮安和漣水官員“拍馬屁”的“傑作”。更有網友直言說，如果李源潮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不是中組部長，請問江蘇官員還會這樣溜鬚拍馬嗎？還會又編著紀念文集，又舉行如此盛大的首發式嗎？

還有評論指出，身為第五代領導人的李源潮，在“非常重視”家鄉編著父親紀念文集，宣傳父親“人格品質”，支持老家搞聲勢浩大的首發式等事實（或問題）上，的確授人以柄。換句話說，如果李源潮仍在江蘇擔任省委書記，他還會贊同這種不但不能給自己帶來榮譽，反而會有損於自己聲譽的宣傳父親的活動嗎？

不管怎麼說，在李干成誕辰100週年之際，李家的子女全都亮相了，從而也我們對李源潮的兄弟姐妹有了更多的了解。

李家的七個子女

李干成家的七個子女是：

長女——李蘇華

長子——李仲之

次子——李偉之

三子——李健之

四子——李源潮

次女——李蘇光

五子——李申初

至於李干成與呂繼英在哪一年結婚，相關資料都沒有提到。但從呂繼英在前夫李超時被殺害後的經歷來分析，兩人大概在1938年或1939年結婚。因為1937呂繼英帶著六歲的兒子李鐵城前往上海尋找黨組織，後來據說在陳毅的介紹下，與李干成相識並結婚。

江蘇網友透露，在李干成與呂繼英結婚前也曾有過一段婚姻，並育有一女。不過，此說無據可查，但從李家子女的出生年分看，似乎也有些道理。長子李仲之是55屆初中畢業生，應該在1939年或1940年出生。三子李健之1965年高中提前畢業考入哈軍工，應該在1947年出生。官方媒體曾介紹，1943年秋呂繼英身懷六甲，後來在老百姓掩護下生下一子，這個在1944年出生的兒子應該是李家次子李偉之。

如果長女確實是李干成和呂繼英所生，1939年左右出生的就是李蘇華，從名字可以看出，她是在江蘇出生的，當時父親李干成正在老家漣水一帶指揮抗日。由此推算，長子李仲之在1941年前後出生，因學習成績突出，1955年（14歲）就初中畢業了。次子李偉之生於1944年或1945年，三子李健之生於1947年，四子李源潮生於1950年。而次女李蘇光，從名字看，應該於1952年生於蘇州，當時父親李干成擔任蘇州專署專員，隨後才出任常州地委代理書記。五子李申初是在上海出生的，1953年末李干成調到上海，1954年初全家搬到上海。

雖然父親李干成只是上海建設大學肄業，但李家對子女教育極為重視，子女全都考入名牌大學。有網友在讀完李家子女撰寫的紀念父親的文章後寫道：從幾篇文章中抽絲剝繭，可知李干成是解放前的大學生，呂繼英也出身於大戶，曾在師範讀書，所以他們家的名字起的還是挺有文化氣息的。

據知情者說，在李家七子女中，長子仲之、三子健之、四子源潮、次女蘇光在校讀書時都屬佼佼者，畢業後都事業有成，但最有出息的當然是家中排行老五的李源潮。

有關長女李蘇華的資料不多，在李家子女紀念父親的文章中，只有李健之提到了大姐李蘇華：1983年，大姐李蘇華的女兒準備2月份結婚，當時，爸爸（李干成）還在華東療養院療養，他專門寫了一封信，讓他的秘書送給姐姐、姐夫。信中寫道：“海玲、海燕的婚事不能大辦。一切應當從簡。不要講排場、講面子、擺架子。這都是不必要，而且是不應提倡的。決不要聽那些好張羅的人的閑話。儉樸是處事之道，是好事。蘇光、援朝的婚事，不聲不響地辦掉，並沒有人說不好。我認為很好。望你們好好考慮決定。”

長子學原子能物理

長子李仲之，畢業於北京大學原子能物理專業，先後任職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國防科工委、大亞灣核電站、國家核安全局等機構。李仲之是蘇州一中1955屆的畢業生，現任江蘇省再生能源協會名譽會長，北京大學蘇州校友會會長。

李仲之撰文回憶說，小時候家在解放區，家境殷實，奶奶又寵著他，使他從小就大膽任性，頗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味道。記得八歲那年為了給一位受婆家迫害含冤而死的堂姐討個公道，居然與區政府領導對著幹，弄得那位區長下不了台。父親聽說他的“好漢行為”非常生氣，“這還了得”，立馬把他帶到了部隊。

李仲之說，他與警衛戰士吃住一起，親身體驗、親眼目睹了戰士們的學習、訓練與戰鬥，行軍時跟不上隊伍就坐在馬背上的搖籃裡。戰爭的烽火和艱苦的生活掃去了他身上的“驕嬌”二氣，很快造就了另一個少年的他。再回到家鄉，他不僅懂事了不少，還當上了兒童團長，領著一幫孩子站崗、放哨、宣傳、演戲、鬥地主、抓壞人，十來歲就成了革命隊伍中的一員。

李仲之四歲認字，前後念了十多個小學，12歲小學畢業考上了淮安師範，但年齡太小不讓讀。解放初期，他一面繼續念小學，一面幫助老師教小同學和參加掃盲活動。13歲入團，一直幫團支部管理全鄉的少先隊工作，是四個小學少先隊的隊長。為了讓他有更好的受教育條件，14歲那年父親李干成把他接到蘇州讀中學。剛到蘇州，一切既新鮮、又陌生。父親工作十分忙碌，但為了讓他儘快適應新環境，仍親自安排他的生活起居，不厭其煩地教他如何收拾房間、疊被子。



李仲之

當時李仲之和父親住在南園招待所，父親每天讓他早起鍛煉，在園內熟悉各種樹木植物，增長知識。記得進中學第一學期，父親一次性給了兒子一學期的費用，可李仲之並沒有馬上拿去繳學雜費，而是“吃喝玩樂”，很快就用掉了一大半。父親知道後，立即找他談話，跟他講勤儉節約過日子的道理，教育他作為共青團員更應該生活上低標準、政治上嚴要求。父親還檢討自己太放鬆對兒子的要求，並採取措施讓專人管兒子，每月只給幾元零用錢，再不許亂花亂用。李仲之說，這種嚴格要求，一直延續到他念上海中學和北京大學的全過程。

李仲之從小就喜歡文史地，高中畢業考大學時一心想念北大、復旦法律系或歷史系，可沒想到父親他老人家不同意。他問兒子為什麼想學法律，兒子說做個審判犯人的法官多神氣，他訓斥兒子說：“就